

中國
林
示
書
目
大觀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國

本

史

記

卷

之

一

五角丛书  豪华本

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 章培恒 主编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BANNED BOOKS*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104号

责任编辑：陈 征 戴 俊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 章培恒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所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625 插页精5平2 字数878,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6次印刷

印数：精装92,001-110,000册 平装13,001-22,500册

ISBN 7-80511-365-3/Z·6 定价：11.90元(精装)

ISBN 7-80511-407-2/Z·10 定价：8.65元(平装)

主 编

安平秋 章培恒

中国禁书简史作者

陈正宏(第一章至第四章)、谈蓓芳(第五章、第六章)、张宏生(第三章第五节)

中国禁书解题作者(以姓氏笔划序)

于世明、卞建林、刘玉才、汪涌豪、宋祥瑞、张宏生、张洪、陈正宏、杨忠、郑利华、侯忠义、骆玉明、顾歆艺、钱振民、谈蓓芳、黄毅、黄霖、曹亦冰、章培恒、童及基、韩结根、詹昌建。

中国历代禁书目录编订者

致 之 达 伟

前 言

“雪夜闭门读禁书”，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分士大夫引为愉快的事。这些士大夫未必都是离经叛道的人，绝大部分倒是出于好奇心。也正是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今天还有许多读者很想了解我国历史上的禁书情况。

然而，如果深入一步地来看问题，那么，通过历史上的种种禁书事件以及有关的规定，我们就有可能增进对我国古代社会及文化的认识。例如，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从汉惠帝到三国时期就没有再禁过书，但至西晋时又有讖纬、天文之禁，并在其后各朝缓慢地扩大禁书范围，宋代以降，势头且猛，清代前期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演变过程正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变化及王朝文化政策的更迭~~，对了解我国古代的历史有不少可资启发之处。就此而言，编辑一部《中国禁书大观》，就不仅是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所以，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为此向我们约稿时，我们就一口承担了下来。

这部书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中国禁书简史》；二、《中国禁书解题》；三、《中国历代禁书目录》。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二百二十种禁书作了举例性的介绍，就我们的所知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希望读者能由此而对我国古代禁书的总貌获得一个大致的轮廓，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限于我们的水平，加以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的尝试，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请求读者批评指正。

这部书所叙述的，几乎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禁书。对于封建统治者为了捍卫自己利益、~~阻碍~~历史前进的禁书活动，本书是持批判态

度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禁书只是一种手段，它可用于各种目的，因而不应该笼统地加以否定，如同本书的《中国禁书简史》所已指出的，太平天国就曾为了革命的需要而禁书（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其客观效果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正因其与封建统治者的禁书性质不同，而且材料很少，本书对此也就不作具体介绍了。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上海文化出版社何承伟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许多帮助，并就如何提高书稿质量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关同志向我们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叶笑雪先生为我们审改了部分稿件。值本书出版之际，谨对上述诸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章培恒 安平秋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

目 录

前言..... 章培恒 安平秋(1)

中国禁书简史

绪言..... (1)

一、幼稚的严酷:中国史上最早的两次禁书事件..... (4)

1. 两千年前的创举——从商鞅“燔《诗》《书》”到韩非论禁书(4) 2. 旷世浩劫——秦始皇“焚书”事件(7) 3. 烬余沉思录(10)

二、北方的飓风:汉——唐五代禁书概览..... (12)

1. 刘邦·萧何·扶书律——汉初禁书及其解禁(12) 2. 同一禁令,两般后果——西晋首禁谶纬天文(13) 3. 为有儒学待复兴——前秦再禁《老》《庄》谶纬(17) 4. 异教典籍的劫难——北魏毁佛经与北周并禁佛道(19) 5. 预言不再走运——南北朝至隋屡禁谶纬(24) 6. 盛世里的几朵乌云——从初唐焚《三皇经》到盛唐禁阴阳术教书(26) 7. 承先启后——五代后周时期的一道禁书令(30) 8. 南北不同风(31)

三、文治的阴影:宋代禁书面面观..... (34)

1. 天文与兵书——太祖至仁宗百年间禁书的两大主题(34) 2. 人间何处不峻岩——从乌台诗案到崇宁、宣和两毁苏、黄文集(38) 3. 千秋功罪,谁人方可评说——南宋屡禁野史(43) 4. 愈织愈密的网——绍兴毁《论语讲解》书版和淳熙严擅刻书籍之禁(48) 5. 宋代的最后一部禁书——《江湖集》(52) 6. 文治大曝光(56)

四、意外的松弛:元代禁书寻踪..... (59)

1. 从宠儿到弃儿——宪宗世祖两毁“伪道经”(59) 2. 学步的背后——忽必烈禁天竺书、明阳伪书(63) 3. 忘乎所以的僧侣与勃然大怒的帝王(66) 4. 可悲的怪圈(67)

..... (69)

努力——禁止小说、清理时文和逮捕李贽(76) 3. 自作多情者的碰壁——向君主进献著作而遭禁毁(83) 4. 翻云覆雨, 纷纭诡谲——由派系倾轧而导致的禁书(87) 5. 野火烧不尽——越禁越多的妖书(96) 6. 长夜自此始(99)

六、惨酷的代价: 清朝禁书总结 (102)

1. 血腥的屠杀——康熙朝的文字狱及禁书(102) 2. 连疯子也不放过——文字狱在乾隆时的登峰造极(107) 3. 在征集图书的幌子下——《四库全书》编纂和书籍的空前浩劫(114) 4. 端人心而正风俗——为禁毁小说戏曲的不懈努力(121) 5. 抽刀断水水更流——清王朝查禁维新派著作及其他(130) 6. 无可奈何花落去——以《苏报》案为中心的禁书事件及其失败(136) 7. 欣慰的回顾(143)

中国禁书解题

秦代所禁书籍 (146)

《尚书》(146) 《诗经》(148) 《左传》(150) 《论语》(152) 《孟子》(154) 《国语》(156) 《战国策》(158) 《老子》(160) 《庄子》(162) 《公孙龙子》(164) 《墨子》(166) 《吕氏春秋》(169) 《山海经》(171) 《吴孙子兵法》(173) 《齐孙子》(175)

晋至唐代所禁书籍 (178)

《春秋元命苞》(178) 《孝经援神契》(179) 真伪甘石氏《星经》(180) 《阿弥陀经》(182) 《楞伽经》(184) 《维摩诘经》(186) 大小品《般若经》(188) 《金刚经》(190) 《法华经》(192) 《涅槃经》(194) 《四分律》(195) 《大智度论》(197) 《中论》(199) 《成实论》(201) 《灵宝经》和《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202) 《上清经》和《上清大洞真经》(204) 《黄庭经》(207) 《太平经》(208) 《老子化胡经》(209) 《真灵位业图》(211) 《正一法文经章官品》(213) 《三皇经》(215)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217) 《真诰》(220) 《六韬》(222) 《黄石公三略》(224) 《七曜历》(226) 《淮南万毕术》(228) 《相法》(229)

宋代所禁书籍 (231)

《唐鉴》(231) 《东斋记事》(232) 《湘山野录》(234) 《嘉祐集》(235) 《苏轍集》(238) 《栞城集》(240) 黄庭坚集(243) 《~~苏轍集~~》(248) 司马光集(250) 《涑水记闻》(256)

元代所禁书籍..... (258)

《西昇经》(258) 《列仙传》(260) 《太上感应篇》(261)

明代所禁书籍..... (264)

《逊志斋集》(264) 练子宁集(266) 茅大芳集(268) 程本立集(270) 王叔英集(272) 《白菟集》(274) 程通集(276) 《剪灯新话》(277) 《剪灯余话》(279) 《易经存疑》(281) 《藏书》(283) 《焚书》(286) 《三朝要典》(289) 《水浒传》(292)

清代所禁书籍..... (296)

《无声戏》(296) 《今乐府》(298) 《拍案惊奇》(300) 《欢喜冤家》(303) 《弁而钗》(305) 《宜春香质》(307) 《金瓶梅》(309) 《如意君传》(312) 《浪史》(314) 《痴婆子》(316) 《肉蒲团》(318) 《南山集》(319) 《钝斋文集》(322) 《吕晚村先生文集》(324) 《何求老人诗稿》(326) 《吕晚村先生论文汇抄》(329) 《皇明四朝成仁录》(331) 《广东新语》(334) 《大义觉迷录》(336) 《闲渔闲闲录》(339) 《徧行堂集》(341) 《岭海焚余》(344) 《初学集》(346) 《列朝诗集》(348) 《国初群雄事略》(350) 《国朝诗别裁集》(352) 《一柱楼诗》(354) 《皇明通纪辑要》(356) 《泰昌实录》(359) 《两朝从信录》(361) 《三藩纪事本末》(362) 《山中闻见录》(364) 《酌中志》(366) 《崇禎纪略》(369) 《幸存录》(370) 《甲申纪事》(372) 《甲乙事案》(374) 《明季遗闻》(375) 《所知录》(376) 《东明闻见录》(378) 《北征纪略》(380) 《女直考》(382) 《双槐岁抄》(384) 《五杂俎》(386) 《喙鸣轩诗集》(388) 《三易集》(390) 《容台集》(391) 《陈眉公集》(394) 《晚香堂集》(395) 《霏云居续集》(397) 《崇相集》(399) 《句注山房集》(400) 《太乙山房集》(402) 《巴吾集》(404) 《隐秀轩集》(406) 《王季重集》(407) 《皇极篇》(409) 《南极篇》(411) 《青来阁集》(412) 《文远集》(414) 《丽崎轩诗集》(416) 《崧阳草堂集》(417) 《石民四十集》(419) 《七录斋集》(421) 《白夸山人集》(423) 《田间诗集》(424) 《定山堂集》(426) 《皇明~~世~~世编》(428) 《翰海》(430) 《鸳鸯缘传奇》(432) 《荣木堂文集》(435) 《虬峰文集》(437) 《小学大全》(439) 《崇禎遗录》(441) 《万历野获编》(443) 《梅花草堂集》(444) 《白苏斋集》(446) 《珂雪斋集》(448) 《歇庵集》(451) 《续幸存录》(453) 《扬州十日记》(455) 《残明纪事》(456) 《江变纪略》(458) 《永历纪事》(460) 《行朝录》(460) 《皇明九边考》(463) 《菰川集》(464) 《~~耕~~真草堂集》(465) 《九箴集》(467) 《韩文恪集》(469) 《姑山遗集》(471) 《蜂桐集》(473) 《蓼斋后集》(474) 《石白集》(476) 《陋轩诗》(478) 《~~道~~氏诗》(479) 《如面谈》(482) 《平寇

志》(483) 《启祯两朝剥复录》(485) 《天启宫词》(487) 《觚剩》(489)
 《说岳全传》(491) 《英烈传》(493) 《心史》(496) 《始青阁稿》(499) 《袁
 中郎集》(501) 《谭友夏合集》(503) 《顾与治诗集》(506) 《离六堂集》
 (507) 《稗畦续集》(509) 《艳异编》(511) 《情史》(512) 《子不语》(515)
 《十二楼》(518) 《载花船》(521) 《八段锦》(522) 《红楼梦》(524) 《续红
 楼梦新编》(529) 《五美缘》(531) 《蜃楼志》(533) 《品花宝鉴》(535)
 《金石缘全传》(538) 《闹花丛》(540) 《杏花天》(541) 《巫山艳史》(542)
 《灯草和尚传》(543) 《株林野史》(546) 《桃花艳史》(548) 《绿野仙踪》
 (549) 《蟬史》(552) 《禅真逸史》(553) 《禅真后史》(557) 《绿牡丹全
 传》(559) 《隋炀艳史》(562) 《万花楼》(565) 《樗枰闲评》(567) 《女仙
 外史》(569) 《西厢记》(571) 《牡丹亭》(574) 《三笑姻缘》(577) 《倭袍
 传》(579) 《芙蓉洞》(581) 《九美图》(583) 《十美图》(585) 《双珠凤》
 (587) 《书影》(589)

中国历代禁书目录

一、秦代至汉初禁书目录.....	(593)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禁书目录.....	(597)
三、宋元明禁书目录.....	(622)
四、清代禁书目录.....	(648)

中国禁书简史·绪言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的国家，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其文化就迅速地发展，后来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史上的最伟大的学说（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也是西方的文化遗产）；比较起来，在那一段时期里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显得十分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倒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与明、清两朝的文化状况具有深刻的联系。那么，中国的文化为什么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统治集团的文化政策无疑是其中之一。而禁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文化政策的反映。因此，研究中国禁书的历史对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很早就开始禁书。如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但战国初期也就是禁书史的开端。幸而那只推行于秦国，而且时间也不长。等到秦始皇统一全国，焚书坑儒，才制造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浩劫。值得高兴的是：这样残暴的统治到底是无法持久的，统一全国后仅仅十五年，秦王朝就灭亡了。紧接着的汉王朝，吸取了秦的教训，在西汉前期的几十年间，对人民的统治较前宽松，汉惠帝时废除了秦代延续下来的“挟书律”，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却并未禁止百家的著作。根据现有的资料，重新下令禁书，是在西晋。但其所禁，乃是天文图谶，而且天文书也并不是根本禁绝，只是禁止民间收藏和学习。自东晋至整个南北朝期间，南方沿袭了西晋的禁令，没有再予扩大；北方则在有的地区和有些时期，将《老》《庄》、佛经、道书也分别列为禁书，但那都只是一时（甚或一时中的一地）的政策。所以，就总体上看，从西晋至南北朝，在文化方面的统治虽有所加强，然而却还不算严酷。隋、唐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格局。鲁迅先生说：“遥想汉人多少闲放，……唐人也还不算弱。”（《坟·看镜有感》）这与从汉至唐的文化政策也是有关系的吧！

从宋代起，禁书的范围扩大了。不但特别注意了禁兵书，而且连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南宋后期江湖派诗人的《江湖集》，私人所著的记述宋代史事之书，乃至有的学术著作都曾在一段时期里遭到查禁。可见宋代的统治集团除了害怕人民造反外，还害怕和仇视本阶级的人批评朝政。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远

比唐代严厉了。所以鲁迅先生说：“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同上）当然，他所说的“现在”，是指他那个时代。

元代是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朝代，其政治上的统治虽然残暴，但大概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思想禁锢却并不酷烈。除了禁止与人民的造反可能发生直接关系的“妖书”和前朝就已禁止的天文谶纬外，当时所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禁书事件是禁毁“伪道经”事件，那只是和尚道士在皇帝面前争宠、皇帝对道士的某些做法不满的结果，并非以加强思想统制为目的。

接下来的明王朝在这方面可就比较元朝高明得多了。朱元璋做皇帝后，老是怀疑士大夫与他离心离德，对他轻视和讥刺，所以莫名其妙地杀了一大批士大夫；稍有辫子可抓的，当然更加要杀，例如孙黄就因给大臣蓝玉所藏的画题过诗，后来蓝玉被认为谋反，孙黄也就作为“蓝党”杀掉了。这些人被杀以后，虽然没有发布禁止其著作的正式命令，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他们的著作就无人再敢刊刻，介于禁与不禁之间。等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做了皇帝，一开始就杀了一大批反对党。他虽然也未宣布这些被杀者的书是禁书，但当他后来发现有人收藏被杀的方孝孺的著作时，把那人也给杀了。这样，这些人的著作实际上也就成了禁书。这以后的皇帝，虽然没有朱元璋和朱棣厉害，但对于禁书的工作也抓得很紧。除了禁那些具有“邪教”、“妖术”色彩的“妖书”以外，思想上不符合规范的书也遭到查禁。因此，《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文衡》之类的文章选本、《观宇篇》之类的著作，都曾成为禁书；至于李贽，更因其所著《焚书》、《藏书》、《卓吾大德》等“惑乱人心”而被逮捕，死在狱中，皇帝并命令将其著作全部焚毁，不准收藏。这些书不仅跟造反无涉，而且也不含有批评朝政的性质，只不过因其内容不符合“圣学”，才落得这样的结果。所以，与前代相比，宋代的禁书增加了压制对朝政的批评的性质，明代更进而以此来统一思想。禁书的范围固然日益扩大，对作者的迫害也日益残酷。自汉代以后，像李贽那样由于著作的思想有问题而遭惨祸的，这是最早的一个案例。

到了清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其前期不断发生文字狱，许多人都被无辜处死，有些甚至连家属也遭杀害。被害者的著作当然成了禁书。这些文字狱，主要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是因其著作含有批评朝政的性质；纯粹是统治者为了示威而制造的案件——例如《字贯》案——也并非没有。与此相呼应，清代统治者又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对当时所流传的几乎全部图书进行全面审查，以确定哪些书可以流通，哪些书在经过删改后方可流通，哪些书不能流通。这后一种也就是禁书，其数总共有几千种。这些禁书，很多都牵涉到民族问题，但也有不少仅是思想问题，如李贽、袁宏道的著作等。可以说，清代是禁书的高峰时期。尽管从嘉庆时期起，像乾隆时的那种文字狱和禁书的事件看不到了，但那并不是统治者的政策有多少改变，而是士大夫已经相当驯服，如同龚自珍在《咏史》诗中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对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那

么严酷了。然而，到清代末期，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禁书这个手段又发挥了它的威力，邹容就因写《革命军》而进了监牢。这以后不久，清朝就灭亡了。

由上所述，可知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为我国历史上积极推行禁书政策、努力禁锢思想的时期。而这两朝，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时期。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不把历史作为偶然事件的堆砌，那么，也就应该承认，明清两代正是我们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后的一系列悲惨事件——的酝酿及其必然上演的时期。

本书所叙述的，就是我国禁书的简史，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尽管禁书事件并未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终结，但限于种种条件，我们的叙述却只能到此为止了。

一、幼稚的严酷：中国史上最早的两次禁书事件

1. 两千年前的创举——从商鞅“燔《诗》《书》”到韩非论禁书

中国禁书的历史，是从西北一隅拉开它沉重的序幕的。

那是在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中原大地六强并峙。而位居九曲黄河那个硕大的“几”字字心下方，由一脉秦岭托负着的一个年轻国家——秦，也正雄心勃勃地酝酿着它角逐中原、虎视东方的庞大计划。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二十一岁的嬴渠梁登上了秦国君主的宝座，是为秦孝公。当时秦的国力及文化水准都比不上中原的齐、楚、魏、燕、韩、赵诸国，而六国也因秦僻居西北，将它视作戎狄，不与它来往。这种屈辱的现实深深刺痛了年轻而有抱负的秦孝公的心，为此他发愤图强，首先向国内外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声称：“宾客群臣中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的，我将给他加官进爵，并分封田地给他！”这一招果然灵验，富有诱惑力的诏令传出不久，一位干练机警的谋士便从邻居魏国渡过黄河，应征而来。他便是后来为秦孝公策划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禁书事件的商鞅——当时还称公孙鞅。

公孙鞅原籍卫国，赴秦前曾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职。据说公叔痤病逝前曾向魏惠王推荐公孙鞅接替自己的丞相职位，在此提议未被恩准后又建议魏惠王杀掉公孙鞅，以防这位年轻才子出国为他君效力。似乎是为了讨好一下自己的部下，公叔痤背着魏惠王又一五一十地把荐职及谋害的事转告了公孙鞅，并劝他速速逃走。令丞相主子大感意外的是年轻的部下断然拒绝他的一片诚意，冷冷地反诘道：“君王既然不用您的提议让我当丞相，又怎么会按您的意见来杀我呢？”果然不出公孙鞅所料，公叔痤死后，魏惠王连一根毫毛也没动他。但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对公孙鞅这位颇为自负的奇才也太没刺激了，所以一听说黄河那边的秦国正缺谋士，他便二话没说，走人。

一入秦地，首要的大事便是去拜见当朝大王秦孝公。大约这次应诏的人不少，公孙鞅好歹托了个关系——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总算见到了西北王国国君的尊容。但起初几次的会面效果并不理想，秦孝公不是听公孙鞅讲到一半便呼呼

大睡，就是等公孙鞅走后便把景监唤来痛骂一顿，搞得景监出来便埋怨公孙鞅。但公孙鞅却不在乎这些，他太想在西北这个被鄙称为“戎狄”的地方一展他东方谋士的才华了，所以一方面死乞白赖地缠着景监，让他在秦孝公跟前多美言几句，一方面又不断地转换口径，从正统儒家的帝道、王道，转而为法家刑名之学，为各种诡异的霸术，终于说得秦孝公坐不安席，鬼迷心窍，把跟前这位邻居家跑来的能言善辩的家伙奉作了上宾。不过此时的公孙鞅心里明白，在爱好霸术的秦孝公手下干活，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秦国改造成一个德比殷周的东方标准文明国家了。

那么，不妨不管什么德与不德，认定目标干起来再说吧。公孙鞅于是在孝公跟前大肆鼓吹他的变法理论：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公孙鞅虽然力主不效法古代，但他为了证明其观点仍不得不举出商汤革命、武王伐纣与夏、商灭亡的历史事实来作佐证。与此同时，有关变法的具体措施，也已逐渐酝酿成熟。据学者考订，出自战国晚期秦人或秦国客卿之手的《商君书》，乃是公孙鞅的后学采集其遗言遗教加以阐发而写成的变法论文集，其中的许多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公孙鞅之手，但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商君书》的《算地》、《去强》等篇中有实行重农重战的理论，《定法》、《赏刑》等文中有推行厚赏重刑的学说。而有关文化禁锢、思想控制乃至禁书的观点也常常夹于其中：

今为国者多无要，……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农战》）

这是一种对文化典籍的蔑视，以为即使每乡每户都有《诗》、《书》，对于治国也是无益的。这种蔑视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种种严酷的禁书理论。比较典型的如：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农战》）

这真是玄而又玄的理论，只要禁止了儒家的《诗》、《书》及其有关学说，便立即可以富国强兵。这种将禁书与否和战争胜负直接挂钩的说法，对群雄纷争、强者为胜的战国时代的各家君主，无疑是极富有迷惑力的。至于像“圣人之为国也，壹

赏，壹刑，壹教”、“壹教则下听上”、“明教不变”、“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之类的观点，则是从教化一律、舆论一律的角度向统治者提供的驭民“良方”。这样的理论虽然缺乏逻辑的论断方式与系统的构架，但对急切地想使国家富强起来的秦孝公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秦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将变革秦法的大权交到了这位东方谋士手中——后来由于变法颇有成效，秦孝公践行诺言，公孙氏官至大良造，得十五邑封地于於商，史因称之为商鞅。

商鞅变法大约始于公元前三百五十六年。有关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韩非子·和氏》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这里所说的“连什伍”、“设告坐之过”就是告密连坐制度，“燔《诗》《书》而明法令”是指禁图书、严法令等措施，“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则谓取消贵族特权、进用贤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乃著名的重农重战政策。由此可见，商鞅在秦国已将他的那套理论全面地运用到了变法实践之中。

《韩非子》有关商鞅变法的记载中，“燔《诗》《书》而明法令”一项为其他先秦史籍所不载，而与禁书有关，尤可注意。在商鞅西入秦国之前，秦国大概已经有了《诗》《书》之类的儒家典籍。《诗经·国风》有《秦风》，其中不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样优美的诗句，而这些锦联妙语据专家考订大多是秦襄公时代秦人的杰作；《尚书》中的《秦誓》，则是秦穆公的誓师之辞。《诗》《书》因其中有秦祖先的作品而在秦地流传，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考虑到秦在战国时代的总体文化水平低于中原六国，则阅读传播《诗》《书》等儒家文献这类较高层次的文化活动大约仅限于秦的贵族圈内，而不是普及到西北高原上众多的凡夫俗子，那也是可以想见的。从这点来说，商鞅“燔《诗》《书》”的规模与范围大约是不怎么宏大的，其目的可能只是为了防范文化层次较高而又亲近中原典礼的上层人物的文弱化，以保证他一手制定的变法措施能够畅行无阻。《韩非子》中将“燔《诗》《书》”与“明法令”并言，也便是这个意思。

但为了“明法令”、防止上层文弱化竟至于采取焚毁儒家典籍这样激烈的手段，在商鞅实在也有不得已处。谋士来自《诗》《书》畅行的东方，看到过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也深知罩着一层温情脉脉人伦面纱的儒家学说是怎样的讲究礼仪、看重历史，限制着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任何层次上的出格行为。这种情形一旦在秦国自上而下地蔓延开来，那么法家的那一套彻底独裁的办法便会失去它的效用，他商鞅梦想的将所有秦人训练得如一支铁的军队的蓝图也会化作一片泡影。所以无论如何，他必须先发制人。“燔《诗》《书》”的火，便这样毫不犹豫地点燃了。

商鞅所制定的一整套变法措施，由于以严格的军事化的方式去推行，终于在秦国得到了贯彻，秦也由此跨入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这套包括“燔《诗》《书》”在内的变法措施，对尚处于封建低级阶段的秦国各阶层，尤其是对于长期享有特